



宋 铜钮钟



宋 铜面具



汉 陶马



宋 白釉瓷状元像

珍贵文物见证古城沧海桑田

文/图 本报记者 朱玉东
本报通讯员 李燕

龙山文化的黑陶片,宋代的铜面具、骑马状元像,明代的青花瓷器……在古城区西北片的东昌府区博物馆北一展厅“府韵千秋——东昌府区历史文化展”展览现场,展出的40件套珍贵文物,以史为脉,以物为证,讲述了东昌古城三次迁徙,历经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。

东昌府区历史悠久,有深厚的文化积淀,其早期文化遗存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。关于东昌府区(即古聊城县)的辖属,唐虞三代属兖州之域,战国时为齐国西界聊摄地,秦朝时始置县,属东郡。汉武帝时在秦郡县制之上增设州部一级,聊城县属兖州部东郡,隋唐及宋金属博州,其后因各朝行政机构名称演变,隶属关系亦有变化,元代属东昌路聊城县,明清属东昌府聊城县。

由于种种原因,东昌古城城址经历三次迁徙。在东昌府区博物馆北一展厅,西墙上一幅巨大的“城址变迁图”十分醒目,图上清晰地标注了不同年代的东昌古城的具体位置。之后,展览以时间为线,从龙山文化的文物开始,图片、文字、文物相结合,将东昌古城的变迁和千年文脉传承向观者娓娓道来。

聊城县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址是聊古庙遗址,位于今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申李庄东,延续时间为春秋至北魏时期,距今已2500余年。建城之前该处早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,展柜内陈列的出土于该遗址、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黑陶片便是最好的物证。

北魏时在聊城地区设平原郡,在聊古庙东20公里处建新城,世称“王城”,后聊城县治由聊古庙迁至王城,王城遂成为聊城县第二座治所。隋开皇十六年(596年)在聊城设博州,将州治也设在了王城,从此开启了博州和聊城县同城办公的模式。近年来,考古人员在东昌府区董桥、付大门、孟闫等村和开发区绳张村发掘了近百座唐代墓葬,出土了不少墓志,由墓志记载推断,王城就是聊城县第二座县治的位置,应在今聊城经济开发区橡胶坝公园及附近徒骇河河床区域。展览现场的展板上,展示了王城复原图,王城平面呈方形,城内布局严整,里坊分区明确,城外修建有用于防御的城墙、羊马城、护城河等建筑和水工设施。

王城治所前后持续了446年,至五代后晋开运二年(945年),因黄河决口致王城倾圮,州和县治南迁至巢陵(即今聊城高新区徐田村附近),是为聊城县的第三座治所。巢陵作为州县治所仅存在了40余年,宋淳化三年(992年),又因黄河决口致城毁,博州和聊城县治同

迁至孝武渡西,即今聊城市古城区,是聊城县的第四座城址,此后未再迁徙。明清时期,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漕运兴盛,东昌府区经济日益繁荣,“东昌”天下闻名,后世称之为“东昌古城”,至今已有千余年之久。

此外,东昌府区博物馆前身是东昌府衙旧址和道署西街的聊城粮库。据《东昌府志》记载,明清时期东昌府署就坐落于光岳楼西北、府文庙以西,今古城区“府衙街”的名称即来源于此。民国初年,山东省废东昌府后设立“济西观察使司”,后改称东临道,道尹公署设于府衙故址及其东邻区域,该街因此得名“道署街”。道署街以原府门口为分界点,又分为东街和西街。道署西街原称府门西街,因府衙坐落于此而得名。1950年,聊城专区粮库在原府衙旧址之上建成,因位于道署西街,故称道署西街聊城粮库。改革开放后,随着票证制度改革和粮食储存方式的转变,粮库库房于上世纪90年代闲置。2013年粮库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2016年被保护改建为东昌府区博物馆。历史与现实再度重逢,府衙旧址、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三重身份集于一身。

记者在展厅看到,现场展示的文物大多是在古城保护与改造过程中出土,品类十分丰富,既有日常生活用具,也有宗教礼仪用器。年代涵盖唐代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,时间脉络清晰,种类繁多,工艺不同,真实地反映了古城的市井繁荣。现场展出的4件青铜钮钟是目前聊城市出土的唯一一组铜钮钟,据考证是宋代祭孔所用编钟的一部分,为研究宋代祭孔乐制和青铜乐器铸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佐证。展厅内一个面目狰狞的青铜面具特别引人注目,它同样是在古城出土,形制十分特殊,形态凶煞,外凸内凹,獠牙外露,五官位置与人的面部比例相近。据考证为战争所用,既可对面部起到防护作用,又能以狰狞造型对敌人施以威慑。因其在全国文物中罕见,曾几次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进行展出。

聊城历来为军事要冲,兵家必争之地,展览的文物也印证了当年聊城曾经是征战杀伐之地。展厅内展示了出土于古城区的国家一级文物——龙凤四年(1358年)“管军总管府印”,该印即为元末农民起义军北上作战,以聊城为据的重要实证。

40件文物沉淀着聊城古城三次举城迁徙的轨迹,它们如同一枚枚时间胶囊,或沾着京杭大运河的潮气,或承载着尘封已久的记忆,裂痕中却渗出新时代的曙光。它们是古城主动蜕下的鳞甲——每一次埋藏都是为了重新生长。